

文学追求美度
史学追求深度
哲学追求高度
理论追求力度
创新追求亮度

周溯源 著

文史哲 三十论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周溯源 著



文史哲

三十论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哲三十论/周溯源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7

ISBN 978-7-216-08958-6

I. 文… II. 周… III. 文史哲—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7698号

责任部门:大众纪实分社

责任编辑:赵世蕾

封面设计:刘舒扬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谢 清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湖北知音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1010毫米 1/16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216-08958-6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19.75

插页:1

印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 MULU

第一篇 文学篇	1
文章要好，标题要巧	3
文章五境界	6
中国社会的良知	
——序《历代忧国忧民诗选》	14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序《激情中国史》	20
论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先进文化中的主导作用	26
先进文化是引领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	41
文化的未来走向与今天的选择	45
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大众化问题	56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文化的繁荣	70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87
论汉字再简化	
——让汉字成为易识易写易记的文字	102

第二篇 史 学 篇	111
历史学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113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新思考	120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38
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	144
论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	149
历史的规律与历史的选择	161
深入研究思想史 促进新的思想解放	170
顺民之欲 富民而治	174
是谁在主宰社会的治乱兴衰	183
——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若干认识	183
中国古代王朝动乱衰亡的体制探密	195
长治久安、振兴中华的治国新方略	223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223
关于国学问题的几点思考	233
第三篇 哲 学 篇	239
关于自由的两个对子	241
论三大矛盾与科学发展观	245
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	272
哲学社会科学也需要自主创新	275
——答《广州日报》记者问	275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务实精神	281
系统辩证看住房	291
路的遐思	301
后 记	310

第一篇

文学篇

文章要好，标题要巧

鲁迅先生说过：记人，最好记他的眼睛。何以如此？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最能反映人的风采和魅力。对于文章来说，标题犹如“文眼”，至关重要。因此，看人先看眼，看文先看题。文眼巧不巧、亮不亮，往往决定文章的命运。现在有的文章标题太平、太长，别人一看标题就不想读这篇文章。

文章标题的弊病由来已久。时下文章特别是理论文章，标题主要存在三种弊病：一是平，二是长，三是公式化。有的标题竟长达十七八个字甚至二十多个字，又平又长，又呆又笨，毫无生气。且不管文章的内容如何，只就标题而言，就因其乏味而使读者扫兴，懒得一读。

那么，是何原因使得标题出现上述毛病呢？我想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有的是才力不逮，实在想不出好标题来；有的是懒动脑筋，不想为标题多费神；有的是缺乏精益求精的追求，满足于过得去就行；有的是责任心不强，不管读者爱不爱看，能达到亮相的目的就行，或者只是为了评职称；有的是习惯于形式主义文风，爱搞党八股那一套，没有个性，缺乏创新精神；也有的是几种情况兼而有之。

人要取个好名字，书要取个好名字，文章也要取个好标题。标题好，能激起读者阅读的渴望，感到不看文章是一种遗憾；标题好，犹如画龙点睛，与文章形成合力，达到宣传目的；标题好，即使文章平一些，也能使读者有所收获。

有的文章标题好，令人拍案叫绝，过目不忘，甚至终生难忘。例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进一步，退两步》，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别了，司徒雷登》，邓小平的《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的《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发展要有新思路》《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等，都是十分好的标题。有些理论家、学者的文章标题也起得非常好，如胡乔木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胡绳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科学的春天》，翦伯赞的《内蒙访古》《桃花扇底看南朝》等，堪称标题的典范。至于鲁迅先生，更是文章高手，他的文和题，极具创造力和个性，诸如《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战士和苍蝇》《骂杀和捧杀》《老调子已经唱完》等，令人回味无穷。

当然，标题怎样才算好，每个人的标准并不完全一样，但我以为有三点是基本的，可以达成共识：第一，贴切、醒目、生动。第二，短一些，简洁一些。人们不爱读长文章，也不爱读长标题，短比长好。当然，并非一概反对长标题，该长的还得长，比如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样的标题不能短。第三，要有个性，切忌似曾相识，人云亦云。如今我们进入了创新时代，提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提倡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章标题更要令人耳目一新。

有人或许不以为然，说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崇尚朴实的文风，标题越平实越好，何须多花精力？这又误解了。平实不等于平淡，更不等于冗长和公式化。“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人们的阅读心理，并非编辑对作者的苛求。当然，起一个好标题亦非易事，没有贾岛的“推敲”精神不行，没有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磨砺精神不行，没有郑板桥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创新精神也不行。不呕心沥血，不搜索枯肠，好标题出不来；没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好标题出不来。写文章就是苦差事，

谁要写好文章，谁就得准备吃苦。这一点，我们的先人深有体会，如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慨，杜甫“读书破万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拼劲，便是明证。

如今，时代在飞速前进，信息在爆炸式增长，读者的鉴赏水平越来越高，期望值越来越大，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广，文章不好他不看，标题不好也不看。怎么办？结论只有八个字：文章要好，标题要巧。

（原载《求是》杂志 2002 年第 12 期）

文章五境界

—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依此引申，作为学问载体的文章（包括部分文学作品），是否也有境界之别呢？在笔者看来，亦可大致分为五重境界。

第一境界，准确明白。把要说的事、要讲的理，说准确、讲明白，做到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通畅，让读者一看就懂，尽量避免字词孤僻而难认、句子太长而难读、语意杂糅而难懂的现象。准确明白是文章的基本境界，也是起码要求。就拿人们常见的新闻报道来说，更应如此。如果一则新闻“五个W”（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不准确明白，传达的信息有误差，社会反响便会大相径庭。现在有些论文难读、难懂，莫非思想太深奥？不一定，往往是表达没有到位。常言道，真理是朴素的，“是真佛只说家常话”。即使是深奥的思想，也可深入浅出，于浅中见深，平中见奇。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只用近 3000 个常用汉字，却将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表述得明白易懂。语言的明确源于思想的明确，思想的明确必然要求表达的明确。那种认为文章越难懂，就越深奥、越有学问的看法是片面的。高尔基说得对：“世界上没有不能用简单明了的话语来表达的事物。”（当然，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著除

外。)问题在于作者是否有这样的追求,是否肯下工夫。

第二境界,生动形象。行文避免呆板、老套、概念化,要用鲜活动感的语言,把事与理说得准确明白,而且绘声绘色,让人读起来有兴致,有美感,如沐春风,如饮甘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生动形象就是要求有文采,讲究形象思维,善比喻,会用典,还有点浪漫幽默。如李白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得活灵活现,令人过目不忘。《荀子·王制》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形象地揭示了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常被引用,提醒执政者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就拿写作讲,乔梦符提出“凤头、猪肚、豹尾”六字,谢榛主张“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因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而成为经典之论。民歌、民谣、民谚,之所以家喻户晓,人们喜闻乐见,关键在其生动形象,活泼风趣。如汉乐府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连五个比喻,形象地表达了“我”对爱情的忠贞执著,海誓山盟,动人心弦。

第三境界,简洁凝练。用较少的文字说明较多的内容,用较短的篇幅讲清较复杂的事理,论题集中,不蔓不枝,篇无闲句,句无闲字,干净利索,像金刚石,体积小,密度大,硬度高。莎士比亚说:简洁的语言是智慧的灵魂,冗长的语言则是肤浅的藻饰。恩格斯指出: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中国自古有“惜墨如金”之训,追求简洁凝练是历代文章名家的传统,“意则期多,字惟求少”,不烦冗,无疏漏,“文简而意周”。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开篇一句“环滁皆山也”,即是典范。广为流传的《古文观止》,收文222篇,无一不是咫尺幅容千里、尺水兴波澜的凝练之作。在王充看来,“文贵约而旨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梁启超认为:“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贵在“简洁”。鲁迅主张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黄宗羲将其书房取名“惜字斋”,追求的就是简洁凝练。

简洁凝练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功力。倘若没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强

的文字能力，就很难做到提纲挈领，高度概括，避免芜杂，一语破的。鲁迅晚年的杂文，大都千字左右一篇，短的仅几百字，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耐人回味，这正是源自他文学家兼思想家的底气。成语、格言、警句是浓缩的精华，是简洁凝练的极品，若无深刻的识见，非经千淘万漉，是得不到的。

文章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思想，不在于字数。巨著并非皆长篇。《论语》只有一万五千多字，《孟子》只有三万五千来字，而《老子》不过五千言。显然，它们成为传世经典，是因其思想而非因其篇幅。传世名文多短篇。既要能做长篇巨匠，更要能做短章圣手。当今信息化时代对短文的期待更迫切，无论是大事情还是大道理，都应写得短些、实些、精些，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最精彩的内容。当然，那些题材重大、内容丰富的文章，该长还得长。但是，即使是非长不可的著述也要力避冗章、冗句、冗字。应切记歌德的忠告：“不要把时间、才力和劳动浪费在空洞、多余的语言上。”

第四境界，质朴自然。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不佞屈聱牙，“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文从字顺，平淡清醇。如“满招损，谦受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句，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质朴自然并非拒绝雕饰，而是雕饰之后又不露痕迹，是饱经历练而臻于炉火纯青，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自然天成，但一个“绿”字，却是经过“到”“满”“入”“过”等数易而后得之，最终达到《庄子》所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境界。鲁迅在《故乡》结尾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几句平常话，哲理却深刻。正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苏东坡总结写作的经验和规律，指出：“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色彩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美国诗人惠特曼也以质朴为高境界，他说：“艺术的艺术，表达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

的焕发，全在于质朴。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王国维断言：“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验诸事实，大抵如此。

第五境界，创新出彩。一篇好文章，重要的标准是义理创新，“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无疑，这种创新出彩，合乎民众的期盼与时代的召唤，是对社会事物认识的深化，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破解，是科学新命题的提出，是对真善美的发现与褒扬，对假恶丑的识别与鞭挞，是针砭时弊，匡谬纠错，扬弃超越。创新绝不是扭曲事实，妄想臆说，诡辩忽悠。有创见新意之文，为文明长河贡献了真理，被人乐道而传播。特别优秀者则被奉为经典，流芳百世。

文章自古贵创新，创新是高境界，也是必要要求。“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力主文章必须创新，“惟陈言之务去”。祖莹提出：“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戴复古主张：“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郑板桥尤喜简洁凝练与创新出彩，由衷地赞美：“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创新出彩，可表现在各个方面，如词句、观点、方法、表述、结构、体裁、风格、学派、理论体系等。“动人春色不须多”。一篇文章创新出彩、形成亮点之处，可能就一两个警句、几十个字；一部著作，做出贡献、被人称道引用的，可能就一两个独到的观点。有了它，就能使文章亮起来，让人开卷获益，爱不释手。如《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滕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阿房宫赋》中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等。近年来主流媒体和学者的文论中，也出现一些新亮点，为人们喜闻乐道。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等。创新出彩宛如闪光的“宝塔尖”，而塔尖则需要坚实的塔基、塔身来支撑。正如谭友夏所说：“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

义理创新大致有四种形式，一是开新城——从头说，二是改旧论——重新说，三是有发展——接着说，四是分取舍——扬弃说。文以意为主，意为文之魂。杜牧指出：“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李渔认为：“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意新、语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谓诸美皆备”，乃为上乘之作。

二

准确明白是为文的基本境界，生动形象、简洁凝练、质朴自然是较高境界，创新出彩则是更高境界。文章境界的提升，取决于多种因素，诸如文字功底、写作技巧、生活阅历、学养程度、情感状态、性格气质、志向追求等。

民谚曰：“《文选》烂，秀才半。”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讲的是要博采厚积，夯实基本功。程颐说：“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袁枚说：“一诗千改始心安。”讲的是要反复推敲、修改磨砺。韩愈说他“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郑板桥说他“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讲的是要毕生钻研，锲而不舍。普遍经验证明，“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

文章高境界的背后是特立独行，是实践的深入、认识的深化、造诣的深厚、追求的坚韧。许多名句名作即是苦难的结晶、生命的羽化。古往今来的好文章，无一不是博采众长而又独辟蹊径，实事求是而又巧于表达，厚积薄发而又千锤百炼，真情实理而又善美兼具。遂有“尽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华章常自改中来”“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等名家经验之谈。陆游作诗近万首，创作经验只有十个字：“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诗外”的“工夫”是什么？笔者认为首要的是理想、信念、精神、责任。没有高尚的人生追求，怎会有血性的文章？心灵如沙漠，笔下不会有绿洲。生活庸碌空虚，文论哪来气象万千？不关心民众的痛痒、民族的进步，怎能撞响时代的大吕黄钟！孟子倘若没有对大丈夫气节的崇尚，

写不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动人格言；司马迁倘若没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不会忍辱负重写出绝唱《史记》；范缜倘若没有对无神的坚定信念，没有追求真理重于求官的高尚人格，写不出力挫王侯与群儒的《神灭论》；曹操倘若没有统一中原的雄心，写不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言壮语；杜甫倘若没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就不会佳句连珠，成为一代诗圣；岳飞倘若没有对山河破碎的悲愤、收复失地的热望，就不会奋笔疾书：“还我河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陆游倘若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拳拳赤心，写不出“位卑未敢忘忧国”“忧国复忧民”；张载倘若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就不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立“关学”；王夫之倘若没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使命感，就不会埋首石船山，苦心孤诣，著作等身。倘若没有对祖国积贫积弱的忧心如焚，对独立富强的魂牵梦绕，没有“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急迫使命，孙中山就不会率先喊出“振兴中华”，提出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毛泽东倘若没有对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力的信念，写不出《论持久战》；“千年思想家”马克思，正是向往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与自由，才破天荒地写出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由此可见，要提高文章境界，必须提高思想境界。心如日月，文方有日月之光。只有做社会的良知，才能写出人民的心声、时代的正声、历史的强音，把文章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三

自古以来，妨碍文章境界的提升，不外乎社会环境和文人素质两个方面。从社会环境看，有六朝以来形式主义文风的熏染，隋唐以降八股科考的诱迫，“焚坑”之后文字狱的桎梏，创新氛围不浓，法制保障乏力等。从文人素质看，则有学养、追求、文风等因素。文章境界不高，主要表现在：

一是内容空洞，陈言老调多，空话套话多。或是有内容却远离民生与学术的紧要课题，“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润色愈工，其实愈丧”。隋朝李谔上

书高祖，批评齐梁文风之弊：“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行；积案盈筐，唯是风云之状”；“损本逐末”，“构无用以为用也”。到了宋代，苏轼指责“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未深入体察民生之艰难、民心之渴求，自说自话。嗷嗷待哺的民众，盼生存之利如大旱之望云霓；居象牙之塔的话语者，仍大谈心性义理，却在闲庭漫步。“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是某些道学者、理学者的事功写照。到晚清，“不务实学、专事浮文”之风尤炽，在洪仁玕眼中，“文士之短简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帖面陈，俱是谄谀赞誉”。此话虽有偏激、夸大，却切中积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认为，那些“惟在仿古欺今”者，“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二是盲目求长，烦冗拖沓。在古代，有“博士买驴，书卷三纸，不见驴字”的笑话。明太祖时，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言事，奏章长达一万七千字，但在太祖看来，“其切要可行者”不过“五百余言”，恨其浮词之多。为何烦冗拖沓呢？或是“私于自是”，不忍割爱；或是“以长为贵”“以长为能”，简单地认为篇幅越长越有学问、部头越厚越有分量；或是不善提炼概括、剪裁取舍；或是为世风习染，言必“戴帽”“穿靴”；或是追求周全稳妥，面面俱到。在当今，有的是受“以量取胜”时尚的影响，为统计成果的量化指标所迫，为达到一定字数而拉长“注水”。当然，也有作者本想出精品“靓女”，但因急功近利，未足“十月怀胎”，就提前“剖腹分娩”；初稿成后，又未能沉淀涵育，用心呵护，在修改环节上下足工夫，而是草草打扮，就匆匆“出嫁”了。

三是创新不足，甘于平庸。黄遵宪曾感叹：“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有的无病呻吟，有的因循克隆，有的浅尝辄止，有的信笔戏说，有的只道“天凉好个秋”，有的追求包装华丽重于济世实用，追求感官刺激重于灵魂净化，未能对学术问题提出创见，就民生问题拿出实招。

文章如何作？先贤有倡导：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贵适用，文贵创新，文不苟作，“文须有益于天下”，“不作无益害有益”。大凡传世名文，必有创新之处，必具高境界。当然，对于一般作者的一般文章来讲，达到基础境界即可，倘能达到较高境界当然更好。但对以写文章为职业、从事社会科学和文学创作的人而言，理应追求高境界，多创精品力作——“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